

科学发展观 与中共历史研究

KEXUE FAZHANGUAN YU
ZHONGGONG LISHI YANJIU

主编 张奇才

副主编 高正礼 姚宏志

安徽人民出版社

科学发展观 与中共历史研究

KEXUE FAZHANGUAN YU
ZHONGGONG LISHI YANJIU

主 编 张奇才

副主编 高正礼 姚宏志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张奇才主编.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212 - 03679 - 9

I. 科… II. 张…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式—中国—文集 ②中国共产党—党史—文集 IV. D616 - 53 D2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86813 号

科学 发 展 观 与 中 共 历 史 研 究

张奇才 主编

高正礼 姚宏志 副主编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发 行 部：0551 - 3533258 3533268 3533292(传真) 邮编：230071

组 编：安徽师范大学编辑部 电话：0553 - 3937079 388357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制：芜湖新欣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960 1/16 印张：16.5 字数：246 千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212 - 03679 - 9

定 价：3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代序一）

张静如 王冠中

科学发展观是一个宏观层面上指导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从本质层面来看，它的精髓和灵魂就是全面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可持续原则和以人为本原则。这些原则和精神实质，不仅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为什么要发展和怎样发展的重大问题，而且对文化建设、学科发展等方面都赋有指导意义。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中共历史研究，就是将这些原则和精髓，贯彻到具体研究之中，按照这些原则的基本精神，来重新审视中共历史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思路，对该学科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应按照这些科学的原则加以纠正和解决。下面分条逐一加以论述。

全面性原则与中共历史研究

全面是一个哲学上的范畴，与之对立统一的另一个范畴是片面。全面并不是要求面面俱到，从辩证的视角来看，全面性原则就是要如何防止片面的问题。同样，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贯彻全面性原则，也并非是说事无粗细、大小和轻重之分，统统加以罗列和均衡研究，它实际上强调的是研究视野要宽广，思路要开阔，知识结构要多学科交融。

第一，宽广的视野与开阔的思路。视野，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看问题的角度。要做到研究视野的宽广，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去考察。研究某一历史事件的发生和结局，就必须考察这一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它的结果又会有哪些历史影响，这种纵向的时间跨度要能够拉得开，视野才能变得宽广。以北伐战争为例，按照生产力发展的这根主线，它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的爆发，而其历史影响又成为导致土

地革命战争爆发的原因，这就是一种纵向的视角贯通。就横向的空间维度而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活动不仅在思想理论上受到过各种国际思潮的影响，而且也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因此，在研究过程中，考察这种空间跨度的范围越大，得出的结论也就更为准确和客观。实际上，这种视角的宽广，就是毛泽东所讲的党史研究的“古今中外法”。

思路的开阔，则讲的是研究理论和方法的运用问题。同一历史事件，用不同的理论作指导，由此产生对历史事件的不同解释模式，得出的结论也可能并不一致。就中共历史研究来说，多年来都是用政治斗争的模式来解释，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党史界提出应该把其放到整个中国现当代社会中去考察，并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社会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活动的目标，而政治斗争以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改革都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手段。不同解释模式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的是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支持。而研究者要做到思路开阔，就必须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结构。把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原则贯彻到中共历史研究中，自然也要求研究者博览众家之长。

第二，多学科研究。在信息化高度发达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和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在理论还是方法上，任何学科都不能再孤立地存在。许多历史研究课题，在经过其他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口学、城市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审视后，得出的结论更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并能提出一些新的看法。因此，实现中共历史研究的多学科交融，势在必行。

与此前相比，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将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中共历史研究之后，使得对社会生活的关照空前细腻，一些此前不为人所问津的领域，也开始有研究成果纷纷问世。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社会保障、控制与调节方面研究党史。二是党史上的城市发展与党的政策相关性研究。这种研究既是对因经济发展而出现的城市化浪潮的一种回应，同时也将城市的发展与党的政策联系起来，阐明了党的政策对一个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三是党史时限内的社会人口研究。人口的数量、质量、构成、繁衍与流动等方面的研究本属社会学和人口学的内容，但党史时限内的人口问题近年来也受到许多党史研究者的重

视。四是社会文化、风俗与党史人物研究。

另外，将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党史研究，带来的另一重大变化就是史料搜集范围的扩大。以前学者很少关注的民意测验等相关材料，在研究中也逐渐派上了用场。需要说明的是，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实际上主要是用其他学科的有关内容，或者叫做其他学科的有关知识。

协调性原则与中共历史研究

协调，就其本义而言，是指事物分散的各部分之间相互配合，和谐一致，以使整体达到一种最优状态的努力。现代企业中所强调的团队协作精神，指的也是这种状态。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协调问题，以前很少有人提，但它同样也是学科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此前各个研究者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协调不够，致使学科发展中出现了一些本可以避免的问题，这是需要认真总结并在进一步研究中加以克服和改正的。

第一，科学分工协作，避免重复劳动。所谓重复劳动，就是指在中共历史研究中，重复做同样的课题。一些学者出于某种目的，对同一题目展开重复研究，既在材料上没有任何进展，又在观点和理论水平上缺乏创新，由此造成人力、财力、物力的大量浪费。这种状况究其根源，主要在于研究者之间缺乏科学的分工协作，尤其是在当前我国学术奖惩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许多人为了评职称，一味追求研究成果的数量而忽视质量。进行科学的分工协作，是避免这种重复劳动的当务之急。一些主管机构和部门，在课题的立项审批和资金发放上，应该注意这种研究内容上的协调。从党史学界来说，作为领导机关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不能只管各地党史研究室，而应该照应到整个党史界，每年做出意向性规划，提出中共历史研究中应该关注的课题。导致重复劳动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研究者对党史学史把握不够，不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前人已经有了完整的研究成果。自己白费了半天劲，成果出来后才知道因孤陋寡闻而造成重复劳动。

第二，既要密切联系现实，又要注重基础研究。在具体的运行层

面，科学发展观要求在经济和社会、人和自然、城市和农村等方面都應該协调发展，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同样应该讲究各方面的协调。一方面，对各个历史时期的研究要协调。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生活重心的转移，对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共历史研究逐渐变得热起来，这较此前忽视这方面的研究来说是一个进步。但任何事情都得有个度，从近年来的情况看，只研究社会主义时期而轻视民主革命时期的现象又变得普遍起来了。虽然说研究重点应放到社会主义时期，但从科学发展观来说，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并不是可有可无的。顺便说一下，密切联系现实，或叫做为现实服务，对中共历史研究来说，指的是对现实问题进行历史的论证和研究现实问题的史的发展，而不是直接研究某一个现实问题，那是别的学科的任务。另一方面，基础研究与具体研究要协调。所谓基础研究，就是有关党史学科基本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这方面一向比较薄弱，其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层次：一是对学科体系的建构，具体包括学科性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时段划分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在指导理论与方法的运用上，像生产力理论、现代化理论、历史主义态度、历史评价标准、比较法、计量法、逆向考察法、系统分析法等等；三是在分支子学科的发展上，如党史史料学、党史目录学、党史文献学、党史版本学、党史校勘学等。这几个层次都属于中共历史学的基础研究，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有待进一步加强。光有对某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对党的某一政策的具体研究，如果基础研究跟不上，理论水平就提不高。

第三，打破条块分割，实现资源共享。协调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主要表现在资源的利用上。就现阶段中共历史研究的可用资源来说，从中央到地方的县甚至乡镇，各级都有相应的党校或党史研究室，资源可谓丰富。但现阶段最大的问题是，各机构或部门之间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的现象比较严重，由此造成很多的资源浪费，这也是出现重复劳动的制度根源。如在档案资料的使用上，根据中国的国情，开放的资料原本就比较少，一些档案馆还以中央有规定为由，本来可以开放的资料，他们为了自己出版东西赢利，而有意对读者进行信息封锁，即便是可以对读者开放的资料，也是拐弯抹角、手续繁杂。这种计划体制下的条块分割

状况，一直延续到现在，既不利于实现资源共享，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原则，在封锁的条件下，协调是无从谈起的。另外，研究者个人之间的协作研究也很不够，有材料的理论水平和组织能力跟不上，有新思想的又缺乏第一手材料。这种情况如不从根本上转变，很难使研究水平有大幅度提高。

可持续性原则与中共历史研究

任何学科，要使其研究具有可持续性，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研究的科学性，它涉及到学科的性质问题，只有科学的东西，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经久不衰；二是研究能力的开拓与创新。就党史学科而言，做到研究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也是贯彻可持续性原则和维持其生命力的要务。

第一，坚持科学性。对于中共历史学科的性质，以前争议颇多。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中期被界定为历史学科之后，党史学界对这种观点表示认同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外界，对中共历史学则很不理解，认为它根本不是科学，而只是一种宣传工具。要正视这些意见，保持研究的可持续性，就必须凸显学科的科学性，在指导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共历史。事实上，在实际研究中，不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所在多有。特别是在引进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时，研究者往往简单地使用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这就不对了。其实，无论引进什么学科，都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

第二，创新是保持科学研究可持续性的原动力。如何实现历史研究的创新，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先生对此做过具体论述。现在讲的创新，就是当时梁公所说的对历史研究“予以新意”，如何“予以新意”？梁启超认为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发潜阐幽”，就是从前的活动，本来很有意义，后人没有觅察出来，须得把它重新复活；二是原来看来完全没有意义的活动，在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之后，忽然看出意义来了，从而给研究“予以新意”。对于中共历史研究的创新问

题，实际上也存在这两种情况。前者着眼于原有史料的重新阐释和新史料的发掘，这要下很多功夫。新史料的发掘有时是很难的，因为容易找到的史料，早已被人使用过，所以研究者要想各种办法去找。当然，这种事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同时，研究者应该时刻注意有关部门公布的一些新的文献资料，以便即时使用。另外，还应该从海外和港台地区的相关研究机构找到一些国内同行看来比较新的材料，在考证其真伪性的基础上，加以使用。对原有的史料也可以重新审视。比如，五四时期的期刊众多，过去丁守和、殷叔彝、张允侯等编写了《五四时期期刊介绍》，起了很大作用，但至今已有数十年，现在看来有些认识需要重新考虑。所以，这样的工作，也应该要下功夫去做。“予以新意”就是强调在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创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原创性研究。要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当然也并非易事，就是党史界的许多大家，有些对理论和思维方式上的创新也重视不够，这与党史学界多年来长期存在的基础理论薄弱的现象不无关系。另外，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重要的是要大力培养一批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精神的研究者和接班人，对于各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党史专业点，在课程设置和导师的教授方式上可以考虑进行配套改革，党史专业的学生应学习一些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各个学位点可以尝试与相关学科的院系或研究机构建立联合培养机制，为该学科的可持续发展培养出知识面更为宽广，更具创新精神的后备军。

第三，确定好选题范围。可持续发展还有另一层涵义，即在研究选题上要有连续不断深入研究的余地。比如，研究人物一定要是有著述、有影响的人物，与党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联的人物。不然，研究一下就没有可以再深入研究的内容了。

以人为本原则与中共历史研究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和本质，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贯彻以人为本原则，就是将研究的视点从“伟人”和个别“精英”身上转移到普通民众那里，把“伟人”和“精英”视作普通民众的一员，既注意

到他们对历史做出的特殊贡献和其伟大之处，同时要发掘出这种“特殊贡献”的民众基础，这就需要加强对平民历史的研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研究普通民众在中共历史上对反帝反封建和社会进步做出的贡献。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事业，他们为革命任务的完成和新中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但从当前的党史著作来看，对普通民众展开详细记载的寥寥无几，但对普通民众的这种研究和记叙却是意义重大。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许多普通民众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上演了一幕幕可歌可泣的历史悲壮剧。《抗战》三日刊中有这么两段记载：16岁女青年刘汉生，当临汾危急之时，不肯逃回湖北老家，毅然参加了山西抗敌决死队。她在给自己母亲的信中说：“在这紧急的中华民国存亡关头，每个中华的儿女应立刻尽他所学贡献国家，我虽没有什么学识，但我愿将所能贡献出来。”另外，江苏一佚名老人在家乡陷落后，困于上海，但在如此危难之际，却把自己沿街乞讨来的钱送到银行捐作救国金。历史上这样的平民活动举不胜举。将普通民众的这些事迹记载下来，其意义至少有二：一是从这些普通民众的言行可以反映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群众基础；二是对历史研究本身来说，这意味着搜集历史素材范围的扩大和研究思路的转变。对一些看来不起眼甚至和历史无关的一手材料，以前很少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但在平民史视角中，它们都是构成历史的“血”与“肉”。最近，中国革命博物馆在这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在公众中广泛征集粮票、具有政治标记的双人床单以及恢复高考后第一年的普通准考证等小件物品，这些历史素材都应当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第二，注意对普通民众自身生活状态和精神历程变迁的研究。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贯彻以人为本原则，最重要的还是要研究普通民众自身生活状态和精神历程的变迁。一方面，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总是首先反映在其物质生活状态的变迁上。例如，西服对中山装的替代、小洋楼对平瓦房的更新等等，这些虽然都发生在普通民众身上，但却是赋有文化意蕴的历史研究课题，因为民众这些生活状态的变迁实际上是生产力发展到何种程度的具体体现，而生产力的解放和发

展，又是整个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主线，所以研究普通民众生活状态的重要性，由此可想而知。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精神历程的变迁，它是一些精英人物提出伟大理论的社会根源。如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就与千万普通民众要求反帝反封建、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自主的强烈愿望紧密相关。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总是会反映到语言、行动、社团组织和生活风俗等各个方面，因此对平民历史的研究，还必须进一步研究这些社会方面的变迁。这与我们倡导的社会史研究还有些不同，着眼于社会的社会史，将人作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从各种社会关系出发进行研究；而以人为本的平民史研究，则是将人从社会中分离出来，强调人对社会的改造以及人在社会演进和变革中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第三，加强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人为本路线、方针、政策沿革的研究。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以为人民谋求自由、解放和幸福为己任，这主要体现在其所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上。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在改变，党在这方面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也有一个沿革和发展的过程，加强对这种政策沿革的研究，从中找出这些方针、政策变更的一般规律，不仅可以找出党在某些历史问题上出现挫折和失误的原因，而且为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如何更好地做到以人为本提供经验借鉴和历史依据。就“以人为本”这一执政理念本身来说，它也有一个过程，此前我们一直提“为人民服务”，反映在党的路线上，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它的理论根基在于唯物史观的这一基本原理，即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亦承认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从理论到党的路线，从“为人民服务”到“以人为本”，对这种沿革以及不同提法所处历史条件的研究，本身也很有意义。

（原载《新视野》2005年第2期）

再说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代序二）

张静如

我在 2005 年《新视野》第 2 期上曾发表过《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一文，说到在中共历史研究中如何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问题。今天看来，文章中所讲还是有道理的，符合中共十七大的精神。在学习中共十七大报告的时候，我前两年毕业的学生王继凯到我家聊天。他说，他所在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讨论时，大家觉得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社会主义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共历史研究没有问题，可对指导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历史研究就觉得不好理解。这就是说，有些党史研究工作者对如何以科学发展观研究中共历史内容感到困惑。

我以为，提出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是对科学发展观的实质不甚了解。发展观是哲学概念，任何哲学体系都有自己的发展观，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则是唯物的、辩证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本质上就是科学的，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即符合自然、社会、思维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就是前进，不符合实际的发展即不科学的“发展”只能阻碍事物的进步。由此可知，严格说，不科学的“发展”就不叫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是指导改造自然、改革社会、改进思维等一切领域的武器。说通俗点叫什么事都管，要想进步都得归它管。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科学发展观不是只管经济领域的事，别的领域的亊都管，也不是只管现在或以后的事，过去的事都管过。使人们产生错觉，是因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前几年的事，而且好像是针对经济发展过热提出的。一读中共十七大报告，上边又说：“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这句话更使人们觉得，科学发展

观只管现在和将来，如果这样认识，就会以为科学发展观管不着以前的事，当然也就无法用科学发展观去研究已经过去了的中共历史。再加上错误认为科学发展观只管经济领域的事，而民主革命时期一直在打仗，那更无法用科学发展观去指导研究。其实，中共十七大报告说得很明白，科学发展观不是只管经济领域的事，还要管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扩大人民民主，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管社会建设和管理，管国际环境的改善，管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等等。中共十七大报告并没有把之前的发展都说成是不科学的，不然怎么叫“经济实力显著增强”、“市场经济初步建立”、“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活力显著增强”、“对外开放日益扩大”。报告明确说：“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只是在发展中还存在着问题，或者又出现了新的挑战，提出科学发展观，是为了纠正那些不科学或不够科学的做法，同时迎接新的挑战，更自觉地走科学发展的道路，解决新课题、新矛盾，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弄清楚了上面说的这些，就不会不知道可以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共历史民主革命时期的研究了。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从开始到结束，虽然中间有曲折，但总的趋势是前进的，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这个过程，就是革命的不断发展的过程。显然，如果它不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之下进行的，这个过程就不能形成，早已因失败而夭折。所以，凡是革命顺利发展，不管人民自觉或不自觉，肯定符合客观规律，也就是体现了科学发展观。反之，肯定是违反了科学发展观。比如，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央领导集体犯了“左”倾错误，按其出发点并不是要损害革命，而是要促进革命的发展。但是，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所用的办法不对头，不是科学的。他们不顾客观实际情况，盲目进攻，拼命战斗，不讲策略。结果，革命不但没有发展，而且受到挫折，出现了危机。

民主革命时期打仗一直是贯彻始终的社会现象，因为中国共产党要

改造社会，不用武器斗争形式就无法推翻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势力的统治。打仗是件很不简单的事，目的是打败敌人，而要取得胜利，必须要掌握战争的规律，要有科学的战略战术，要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既是一部军事著作，又是一部哲学著作，它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对中国革命战争战略的指导。毛泽东指出：“一切战争指挥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所以，战争指挥员必须努力学习，掌握战争规律。毛泽东强调：“我们不许任何一个红军指挥员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我们必须提倡每个红军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不但有压倒一切的勇气，而且有驾驭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形成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战略战术，多次打败拥有先进武器的国民党军队，最终取得全国性战争的胜利，取得到全国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民主革命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不光是打仗，还有其他领域的工作。比如，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都有个团结大多数人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这就要用发展的眼光科学地分析统战的对象。最典型的是1937年开始的抗日战争前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此，中共中央作了科学的分析，认定“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于是，中共中央提出新的任务，建立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及汉奸、走狗开战。又如，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区、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里，都有经济工作、文化工作以及社会管理工作。这些工作的成绩或失误，都与符合或违背科学发展观有密切关系。

总之，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研究包括民主革命时期在内的中共历史的内容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

（原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8年第2期）

目 录

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代序一）	张静如 王冠中	(1)
再说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代序二）	张静如	(1)
科学发展观视阈下的中共历史研究	肖 芳	(1)
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的方向	张建彬	(7)
科学发展观与中共历史研究	劳开准	(13)
科学发展观与建国后中共历史研究	吴国斌	(19)
以人为本与中共历史研究	刘 翠	(23)
从以人为本的角度解读党的历史	李有福	(29)
科学发展观与农村基层党建研究的新思考	窦文静	(35)
科学发展观基本内涵和历史地位的再认识	袁婧京	(40)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发展观的演变	程园园	(45)
科学发展观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肖军华	(50)
科学发展观的三个价值向度	王锦辉	(57)
浅析科学发展观下的人本思想	韦 琼	(63)
科学发展观在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历史任务中的作用	高 兴	(69)
政治动员与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	胡 勇	(74)
十五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理论创新	朱召师	(79)

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中国特色政党制度建设	韩 颖	(85)
科学发展观视阈下执政党伦理建设的新要求	吴茂朝	(91)
协商民主视阈下中国政党制度的合法性分析	王 坤	(97)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黄 平	(103)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党的政治动员工作	朱晔文	(108)
改革开放以来党群关系建设方式的转变	周家伟	(114)
社会公平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	耿 虹	(121)
和谐民族观简论	李 艳	(126)
科学发展与新中国初期工业化战略的再认识	高鹏虎	(131)
1953—1957年新中国市场和国家关系的历史考察	刘 静	(137)
研究新中国金融安全史：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时代诉求		
——以建国后陈云对金融安全的理论思考为研究范本	刘 伟	(143)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三农”政策再认识	向 刨	(149)
新时期以来中国农地制度市场化改革的历史演进	侯 微	(155)
新时期我国农地制度的创新	张 辉	(162)
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安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路径探析		
——以 2008 年以来安徽农业发展状况及政策措施为例	王 海	(168)
毛泽东“两条腿走路”思想探略	高其荣	(175)
六十年来我国城乡关系的历史回顾	马俊杰	(182)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的途径及意义	彭 升	(187)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文化转型及其建设	詹 玣	(193)
科学发展观视阈下延安精神的三维度分析	魏建克	(200)

目 录

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井冈山精神研究	杨宇光 (206)
邓小平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论析	李红涛 (212)
《星期评论》与五四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	张忠山 (218)
社会心理变迁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程 琳 (228)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的社会环境治理	胡国胜 (232)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解决民生问题初探	陈兰英 (240)
后 记	(247)